

◎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学者文库 ◎

中国 近代史学史论

李红岩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学者文库 ◎

中国 近代史学史论

李红岩/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史学史论/李红岩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7-5004-8563-6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史学史—中国—近代—文集 IV. ①K092. 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4583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韩小群
责任校对 曲 宁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426 千字

定 价 5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学者文库》序

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建社三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1月创刊）迎来创刊三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1日创刊）创刊一周年的特殊日子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诸同仁精选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汇集成这套《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学者文库》出版了。这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科研人员呈现给自己单位的一份深情厚礼。

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始终坚持“编研结合”的方针，要求编辑人员结合自己的编辑工作，认真研究理论和学术问题，既要密切跟踪国内外学术前沿，又要准确把握本学科的学术历史；既要关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又要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努力形成自己的研究理念、研究风格和独到见解。正是浓厚的学术氛围、严谨的学术风气、深厚的学术积淀，使杂志社不同于一般的编辑机构，它拥有一支具有较深理论造诣和学术积累的科研队伍，推出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的学术报刊，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学术水平，在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洪流中，占有醒目而且重要的位置。

最近几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的关心和领导下，进一步加强了对理论学术前沿的研究和引领，率先在全国期刊界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编辑室，建立了理论前沿研究中心，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份全国性哲学社会科学专业报纸《中国社会科学报》，完善采、编、发流程管理，大力实施“开门办刊”和“开门办报”方针，更加强调“编研一体化”，努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专家型编辑、记者，努力为推动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学术话语体系作出更大贡献。这套学术文库，可以说是对杂志社编研结合办社方针成果的一次检阅。

尽管这部学术文库所收论著，既有离退休老同志的论文辑录，也有在职同志的自选集，还有青年同志的学术专论，但毕竟只是部分同仁的科研成果，未必代表杂志社工作人员的最高学术水平。当然，从其所涉领域、研究理路、学术风格中，人们能或多或少地体会到杂志社独特的学术视野和科研特色。

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充满挑战、异常艰辛的工作。在这里，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坚强的意志，没有经受挫折、百折不回的精神，是不可能做出任何重要成绩的。好在中国学术，具有源远流长的优秀学术传统，无论是从事编辑工作，还是从事科研工作，只要认真反思、体会、继承这些优秀传统，就能够获得一些重要的教益。

一是求是的传统，也就是追求真理、探索规律的传统。真正的学问家，从来都将认识人类之命运作为自己全部学术活动的出发点，力图通过对社会关系、社会形态的反思，通过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反思，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结论，即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事实上，高层次的学术活动，不但是严谨的，而且是思辨性的，充满了理性的睿智。

二是求真的传统。学术研究，就其直接目的而言，就是揭示和研究人类活动的各种形态。这决定了它必须将具体的事实作为自己学术立论的重要基础。明儒王阳明曾提出“五经亦史”的重要论断，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其言未必准确，但反映了中国学术注重事实、不空言义理的重要传统。学术的科学性，首先取决于研究者是不是在依靠事实说话。事实的论证，要永远重于空洞的说教。

三是经世的传统。这就是主张学术研究要服务国家，服务民族，做到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经世不但是研究目的，而且是一种道德，一种精神，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学问回报社会的高尚情操和庄严责任感。在中国传统社会，学术从来都以经世为其基本目的。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一文中，明确阐述了自己以史经世的学术主张：“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这就是说，注意人伦日用，关注时代需要，是章学诚治史的重要特征，也

是其以史经世的基本内容。正是经世的传统使史学在中国历代社会与政治变革中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

环顾当今学林，中学与西学互动，传统与现代并存。然而，我们民族悠久、深远的优秀学术传统，仍是我们前进的基础和出发点，是不可或缺的智慧宝库。学术研究如果不以求是为目的，如果不关注、不探索社会演变的规律，以烦琐考证取代理论思维，以堆砌资料为博，以叠床架屋为精，拾芝麻以为玃珠，袭陈言而自诩多闻，以偏赅全，见小遗大，学术就注定要丧失自己应有的精神境界，在由无数具体事实堆积而成的汪洋大海中迷失方向。一旦如此，其着力逾多，其离科学精神所追求的境界愈远。但另一方面，如果缺乏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缺乏对规范的必要尊重，脱离实际，游谈无根，空言“义理”，或以一偏之见为理，或以望文生义为理，或以自逞胸臆、杜撰“体系”为理，或以拾洋人、权威牙慧为理，学术也会丧失自己的精神境界，堕落为“玄学”。就学术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如果缺乏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学术研究与服务现实简单对立，学术将不但会丧失发展的余地，而且也会逐渐丧失生存的空间。反之，如果将经世致用简单化、庸俗化，用应时之作取代理性而严谨的科学探索，学术就会堕落为“俗学”，也谈不上起码的尊严。

当代中国正面临着极其宝贵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当代中国学术也是如此。如何立基，何去何从，是每一个治学者都不能不面对的重大问题，岂可不深思而慎择之。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学者文库》付梓之际，潦草数言，权充书序。

高翔

2010年4月于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院

目 录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与形成·····	(1)
20 世纪 30 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之原因探析·····	(18)
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	(49)
《读书杂志》与中国社会史论战·····	(87)
“封建”论争与陶希圣的观点·····	(111)
中国古代史学文本的理论与实践·····	(128)
钱锺书论六经皆史·····	(154)
夏曾佑传略·····	(191)
刘师培的前半生·····	(218)
刘师培何以要背叛革命·····	(276)
刘师培遗稿之谜·····	(297)
王国维开罪沈曾植·····	(302)
史术通贯经术：柳诒徵之史观·····	(306)
钱锺书古典文学研究的特征与贡献·····	(324)
历史学是包含文学性的科学·····	(342)
开明通达 史思深厚	
——读吕思勉《为学十六法》·····	(347)
充实而有光辉	
——读严耕望《治史三书》·····	(351)

史学“非主流”与“史学方法”·····	(354)
华好九章论史学·····	(357)
揭示中国历史奥秘的一部力作·····	(362)
静心细审历史的“复活”·····	(366)
看王立群如何演绎大汉精神·····	(369)
走向形而上学的中国近代史学·····	(373)
学术评价如何实现公正·····	(377)
写出一个城市的传记	
——《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	(380)
“于丹心得”之后的又一部《论语》新解·····	(383)
一部优秀的年鉴学派概览·····	(387)
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	(390)
完美主义的学术经典：《管锥编》·····	(397)
后记·····	(401)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 建立与形成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质，在于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于 20 世纪 20 年代，形成于 30 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建立与形成，是当时国际形势与国内形势相互作用的结果。具体说，有四个要点：

一是晚清民初资产阶级史学的最新成果“新史学”，为它奠定了学术基础与平台。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对晚清新史学的超越与扬弃。二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为标志，世界战略格局发生根本改变；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为标志，中国的政治生态及文化、思想环境，也发生形态性转向。国际、国内两大因素相互作用，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提供了时代基础和直接动力。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上述国际、国内两大因素在思想文化领域分化及深入发展的结果。三是作为以无产阶级革命为核心内容的全球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列宁领导下的新生苏维埃政权在中国直接指导了大革命运动，大革命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态势，直接催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四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一大批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和史学家的涌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提供了最初的代表人物和著作，建构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内容。

由此四点可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产生，乃历史之必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后，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及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互动中逐步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走向马克思主义，是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基本脉络。

众所周知，中国具有悠久的史学传统。但是，20世纪以前，中国没有马克思主义史学。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整体社会形态的转向，古老而悠久的中国史学也开始了向近代形态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初期以龚自珍、魏源、徐继畲为代表，中期以王韬、郑观应、黄遵宪为代表，最后于20世纪初年形成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所谓“新史学”。

“新史学”是建立在批判和超越封建旧史学基础上的一种全新的史学样式，是旧民主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史学所取得的最高成果，在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新史学”的领军人物虽然以资产阶级改良派（如梁启超、夏曾佑）为主，但革命派学者（如章太炎、刘师培等）也作出了很大贡献。所以，“新史学”代表了晚清时期的整个资产阶级学术阵营。^①新史学的意义从根本上说，在于它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奠定了逻辑的起点和学术的基础。如果没有“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就要直接面对封建旧史学，就会付出更多艰苦的工作。有了“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就可以直接超越封建旧史学，在资产阶级所建立的学术与思想起点上，实现更高层次的超越。

第一，“新史学”已经具备晚清时期最完备的世界眼光，这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世界统一性和规律性的特征相衔接。从龚自珍、魏源、徐继畲等人开始，进步的中国史家即开始以一种世界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历史。其后，从世界性的眼光出发，成为王韬、郑观应、黄遵宪等人著作的共同特点。正是他们，改变了两千多年来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念，开始将中国视为世界的一部分，最早开创了近代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康有为、梁启超、夏曾佑、严复、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登上历史舞台后，更是竭尽全力地吸收世界历史知识，将中国放在世界历史发展和全球大势变动的格局中予以思考和观察。从此，在史学观念上，中国与世界无法再分离。这

^① 在《〈刘申叔先生遗书〉序》中，钱玄同曾说，辛亥革命以前，有12位学者最值得关注。他们是：康有为、宋恕、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太炎、孙诒让、蔡元培、刘师培、王国维、崔适。其中既有改良派，又有革命派。就史学范围来说，这个名单还可加以扩充，如陈献宸、汪荣宝就可以列入。

种全球性和世界化的眼光，是史学观念上的一场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一致。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一种立足于全球化和具有世界性目光的史学。

第二，“新史学”是以“经世”为价值取向的致用史学，是与时代脉搏息息相关的实践性史学，这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性与革命性的品格相衔接。从产生根源上说，“新史学”乃出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相逼相迫”，并不是从书斋中自发地生长出来的。所以，“经世致用”、爱国图强是自龚自珍到梁启超一以贯之的主题。“新史学”家们深刻思考国家民族命运，尝试着从历史中寻找使祖国走上富强之路的努力，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继承的重要遗产，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启示和方法意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是一种“经世致用”的史学，是应时而起的史学，是将历史与现实打通的史学。

第三，“新史学”家所尊奉的进化史观，虽然与唯物史观具有本质区别，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相信人类进步、追求人类进步、构建历史阶段演进模式的属性相衔接。当然，在不同的新史学家身上，对进化史观的尊奉程度是不同的，进化史观本身也颇多缺陷（如单线一元性、简单化等等）。还有一些新史学家最后放弃了进化史观。但是，总体上看，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主要是在晚清时期），进化史观是新史学家们整体上的价值取向。进化史观以进化、进步的理念为前提，而马克思主义史学所遵奉的唯物史观，同样是一种进步史观。

第四，“新史学”对封建旧史学所展开的猛烈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具有的批判性的品格相衔接。“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梁启超等人曾经提出“史学革命”口号，并且与当时的今文经学思潮、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相配合，汇合成晚清思想解放与启蒙运动的巨大潮流。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在前人“革命”的基础上继续“革命”，在封建史学日益没落和边缘化的基础上使其愈加没落和边缘化，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转向不可逆转的基础上使其继续前行，实现超越。

第五，“新史学”家“伸民权”、“写民史”、“去君史”，鼓动史学通俗化，强调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一系列主张和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人民群众历史作用、打破王朝体系、以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治史的特性相衔接。“新史学”从“历史哲学”到编撰理论，都增加了许多旧史学不具备的内容，许多西方的历史著作、历史理念、历史话语，被介绍引进到中国

的历史学当中。这些理念与话语，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批判对象，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建立的平台和基础。

所以，就学术流变而言，“新史学”实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孕育阶段，是学术传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清扫了道路，作了逻辑的、思想的以及学术资料上的准备。不消说，梁启超等人在建构“新史学”的过程中，不仅曾经提到马克思，而且还对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学说有所认识和介绍，已经接触到唯物史观。^①

但是，“新史学”无法自发地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归根到底，它既是一种唯心主义史学，也是一种形式主义史学，思想源流庞杂而多元，许多见解也偏激而错谬。由于它不懂得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不懂得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角度去阐释历史，因此，它“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对历史主体背后的诸多“奥秘”只能触及，无法揭示。因此，它虽然已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却只能徘徊于门外，进而抵触与抵制，非但不能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而且还会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愈加背离。因此，辉煌期过后，当更大的社会变局到来时，“新史学”立即与时代脱钩，成为明日黄花，落在了时代后面。一方面，在史观上逐步走向相对主义，直至与唯物史观直接冲突；一方面，在研究领域上逐步向历史考据及所谓“纯学术”的方向退缩，不复当年的宏大气魄与气象。故尔，就连新兴的资产阶级史家，都开始批判它。新史学被更新形态与样式的史学所代替，也就成为了必然。

二

辛亥革命后，“新史学”走向衰落。其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更使得新史学从文化的中心位置旁落，以至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中国人民首要的历史任务，这就需要有新的文化、新的史学与之

^① 早在1902年9月，梁启超就对马克思作过简单介绍，从而成为最早在个人著作中提到马克思名字的中国人。不过，“新史学”在介绍马克思主义上的最高成果，应当是1908年前后刘师培、何震夫妇所主办的《天义》报对《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的翻译介绍。

相适应。

这个时候，由于列宁领导的新兴苏维埃政府推行对华友好政策，主动放弃旧沙俄政权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特权，同时积极在中国开展活动，适应了中国社会的紧迫需求，所以列宁的世界革命及殖民地理论在中国得到快速传播，原已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很快滚动为潮流。这股潮流不仅与旧有的及新出现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峙、较量、斗争，而且很快便转入政治实践的层面：一是直接介入政治言论，二是积极影响青年学生，三是在莫斯科的指导与帮助下，直接创立组织。直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政治组织基础。可以这样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诞生、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而成长、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而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使命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因此，从起点上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而生。就政治属性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与建设事业的组成部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是一种学术样式，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理论信仰和意识形态。但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壮大来看，它并不是推行意识形态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信仰并倡导唯物史观，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可能强迫人们接受和信奉唯物史观。人们是否相信唯物史观，是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靠拢，主要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能否对中国历史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学解释，能否作出超出其他史学流派的优异成绩。事实表明，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最先进的政党，具有最先进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最先进的理论无论在解剖现实还是在观察历史方面，都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性与科学性，这就使得弱小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然会在各种史学流派纷呈歧出、竞相表现的环境中，脱颖而出，迅速壮大。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便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领导下，与中国国民党实行政治合作，于1923年6月至1927年7月实际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席卷全国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大革命运动，又称“国民革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是在这场大革命当中建立起来的。

大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思潮已经初步实现了与中国社会，特别是与进步青年学生的结合。但是，这股思潮主要局限在知识分子中间，没有触及更广泛的中国社会，与工人、农民、士兵等社会阶层是脱节的，更谈不上触及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唯物史观，大体上局限为书本上的原理或道理，没有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大革命一开展，情况立刻就不一样了。

大革命是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政治运动、军事行动，也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运动。这场运动对中国社会结构及人们思想的冲击，超过以往的历次政治与文化变革。从此，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尊奉的意识形态和理论信仰，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国民党。当时，许多后来成为反共急先锋的国民党右派人物（包括蒋介石、戴季陶），也曾经学习某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受到马克思主义一定程度的影响。舍弃马克思主义，即无从从本质上观察中国社会。没有第二种理论可以代替马克思主义。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中国的现实社会和历史进程，成为许多人的思想自觉。可以这样说，凡民国时期曾经与唯物史观有过接触的重要人物（更无论曾经以唯物史观释史之史家），几乎都是在岁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能够触摸到社会现实与历史的本质问题，乃始于大革命。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中国现实社会，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眼下的中国社会状态到底是什么性质。这个问题本身，其深刻性即前所未有，为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学人所想不到、提不出。只有回答这个问题，才能为大革命找出理据，为革命规划目标。因此，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建立的直接动因。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也因此而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之源。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意识到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重要性。因为，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政党性质直接关联。当我们说中国共产党是最先进政党的时候，其中一层含义，是说它一登上历史舞台，就能够提出并解答时代所要求解答的最急迫、最深刻的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早期著述，几乎毫无例外地触及或论述到这一问题，几乎毫无例外地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其思想行程。其中，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萧楚女、罗亦农等人发表的文章或言论，最具有代表性。毛泽东的名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

考察报告》，均是社会性质之作。这些文章和言论虽然还不够系统和完整，认识上也不乏模糊之处，却是在列宁思想指导下，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的最初尝试，指示了尔后的思考方向。同时，在国民党（主要是左派）和关注现实的学者中间，也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结果，到“五卅”运动前后，出现了最早的一批专门探讨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著和刊物。例如廖划平《社会进化史》，张伯简《社会进化简史》，漆树芬《经济侵略下之中国》，彭湃《海陆丰农民运动》，李达《中国产业革命概观》，郭真《中国资本主义史》，吴贯因《中国经济史眼》，刘大钧《我国农佃经济状况》，陈达《中国劳工问题》，唐道海《劳动问题》，等等。此外，外国人的著作，如波格丹诺夫《经济科学大纲》，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马扎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长野朗《中国社会组织》、《支那土地制度研究》，伊藤武雄《中国产业组织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颇为流行。刊物则有《中国农民》、《工人之路》、《中国工人》，等等。从学术传承来看，后来发生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正是以这些论著为开端的。也就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框架，乃由大革命所引发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发其端。特别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乃直接以近代社会性质问题为核心。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直接建立者，首推李大钊。众所周知，李大钊是我国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又是五四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李大钊还是大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和推动者。他不仅是第一位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还是国民党内身份最高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当时，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发表各类意见和观点的，正是李大钊，而不是对国共合作政策心怀不满和抵制态度的总书记陈独秀。李大钊这种集多重身份于一身的特点，鲜明地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时期的多重性特征。从晚清到民国，像李大钊这样既具有国际组织背景，而又集理论家、宣传家、政治活动家、政党创建者及大学教授于一身的人物，找不出第二位。因此，要搞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建立的主要条件以及在建立过程中的主要特点，就需要对李大钊的多重身份及活动领域予以综合体认。

早在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就具备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与观念，萌生了共产主义思想，为创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储备了个人条件。他创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过程，可以概括为“四个结合”。一是与传播

马克思主义理论密切结合，二是与宣传十月革命密切结合，三是与中国的现实政治密切结合，四是与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斗争密切结合。从这四个结合，可以看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其建立之时起，就具有鲜明的理论性、革命性、实践性及批判性。

李大钊的史学著作，主要刊布于大革命之前及大革命的早期，但与大革命的时代脉搏息息相关。其中著名的论著，如《史学思想史讲义》、《五一运动史》、《大英帝国侵略中国史》、《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史学与哲学》、《研究历史的任务》，对参与大革命活动的人士的影响至为深刻。而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里程碑。李大钊的这些论著，是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出发的，将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历史的共产主义发展目标密切联系起来，客观上也勾画出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史研究模式。

与李大钊同时或稍晚，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先进分子，如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罗亦农、张太雷、杨匏安、李达等人，都曾经在大革命期间积极撰写文章，宣传唯物史观。因此，他们虽然不像李大钊那样直接，却同样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建者。李大钊是他们的代表。这种情形，在形式上颇类似于1902年前后的新史学，亦即以梁启超为代表，同时涌现出一批既论政又论学的高手。据不完全统计，1925年到1927年，仅上海出版的马恩著作和书信单行本、专题文集等，就达50多种，其中包括了《资本论》、《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家庭和私有制的起源》、《政治经济学批判》、《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经典名著。而蔡和森1924年出版的《社会进化史》，是我国第一部用唯物史观写成的社会发展史。同年，瞿秋白出版了《社会科学概论》。李达则于1926年出版《现代社会学》。这些著作与李大钊的著作具有共同的特点，即都或轻或重地具有“四个结合”的特点，特别是反帝反封建的主题，格外突出。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建立过程当中及建立不久，便写出了最初的一批优秀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给人的感觉是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特别是对旧式学者来说，可谓闻所未闻，平生仅见。当然，这些著作还仅代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初形态，虽然尝试着将唯物史观落实到具体的中国史实中去，但总体上说还是初步的，还没有与中国历史实行全面的系统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专业史学队伍也没有形成，许多深层次的历史理论与

技术性的史学理论问题还没有涉及。担当马克思主义史学建构工作的，大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第二国际某些错误理论的影响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这种情况，与国共两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尚未破裂、共产国际内部对中国问题缺乏深入认识以及托派问题还处在萌生状态等背景，是相互关联的。但是，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属性和诸多特点，均已在其建立初期具备；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目光锐利、高出时流的光彩，已得彰显。这就规划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走向。

三

1927年7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惨烈失败。这场革命的失败，是民国历史的转折点，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大革命失败的一个思想成果，就是迫使人们追问：到底应当怎样革命？到底应当怎样认识中国社会？共产主义运动到底在中国适合不适合？这样，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步骤、革命方法等问题，不但没有因大革命的失败而消歇，反而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摆在了人们面前。要回答这些问题，除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之外，别无他途。

当时，蒋介石集团推行一个政党、一种主义的专制统治，对马克思主义极力扼杀。1929年7月，外交部长王正廷在关于中东铁路事件的说明中就曾说：“世界各国之对于共产宣传虽有禁有不禁，而吾国法律实在必禁之列。”^① 蒋介石本人更是公然叫嚣，要“在一定时期内，把共产党的一切理论方法和口号全数铲除”^②。他恫吓青年人说，如不退出共产党“皈依三民主义”，就要给以“最严厉的处分”。^③ 但是，正是在这种肃杀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反而成为了“时髦”。据说，“1928年至1932年短短的时期中，除了普罗文学的口号外，便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之介绍。这是新书业的黄金时代，在这时，一个教员或一个学生书架上如没有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52页。

^② 蒋中正：《革命和不革命》，《新生命》第2卷第3期，1929年3月。

^③ 蒋中正：《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党共产革命的区别》，《新生命》第2卷第5期，1929年5月。